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美] 顾史考 著

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期中国研究丛书



[美] 顾史考 著

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微观 / (美)顾史考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0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6454-5

I. ①郭… II. ①顾… III. ①竹简文—研究—楚国
(? ~前 223) ②儒家—哲学思想—研究—先秦时代 IV.
①K877.54 ②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954 号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微观

[美]顾史考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06,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978-7-5325-6454-5

K·1584 定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朱渊清、陈 致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渊清

[美] 李 峰

[英] 汪 涛

[美] 张立东

陈 致

[日] 高木智见

唐际根

曹 峰

丛书序

“早期中国”是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长期形成的一个学术范畴,指汉代灭亡之前(公元 220 年)的中国研究,或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研究,此一时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于 1975 年创办 Early China 杂志为标志,“早期中国”这个学术范畴基本确定。哥伦比亚大学近年设置的一个常年汉学讲座也以“早期中国”命名。

“早期中国”不仅是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分类,而且是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实质性概念。

从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广大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帝国建立,并且在汉代走上农业文明之路、确立起帝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完善科层选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标准,早期中国经历了从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早期中国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孕育、塑造了此后长期延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编户齐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稳定维系;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汉化,帝国疆域的扩张主要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结果;各种宗教基本不影响政治,世俗的伦理道德教化远胜超验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导的价

价值观体系以及由此造就并共同作用的强大的官僚制度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等等。追源这类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历史选择形态(动因与轨迹),对于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乃至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价值观体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国研究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重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国研究在中西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这就是:扩充研究资料、丰富研究工具、创新研究技术,多学科协同不断探索新问题。

1916年,王国维以甲骨卜辞中所见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一一对照,发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绝大部分出现在卜辞中。王国维把这种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出土文献资料在现代的早期中国研究中显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 100 年来约出土 15 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 34 844 片。青铜器铭文,1937 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 4 831 件,其中绝大部分为传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录资料到 1988 年止,共著录了金文 11 983 件。此后到 2000 年,又有约 1 350 件铭文出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简帛文献资料如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定州简、阜阳简、郭店简、上博简等都以包含大量古书而深受关注。

严格地说,王国维说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还是

文字资料,这些发现当时还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研究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学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证据。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张结合文献考证与文物考证,扩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刻开始发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请发掘殷墟的报告中说:“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从1928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共11处,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这15次发掘收获巨大:在小屯北地发掘了53座宫殿基址。在宫殿基址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约1公里处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地发现了商代王陵区,发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高楼庄后岗,发掘出了仰韶、龙山和殷三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三种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在后岗还发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区,如大司空村等地还发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学发掘举世震惊。中国考古学也从开创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为历史的特色和风格。为历史的中国考古学根植于这块土地上悠久传承的丰富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淀,强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城址还是商周墓葬的发掘,都是早期中国文明具体直观的展示。

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检核,不同属性的资料相互印证,提供我们关于早期中国更加确切更加丰富的信息,能够不断地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又因为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而探寻无限更多的资料,而使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入愈益全面。开放的多学科协同的综合研究使早期中国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其他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来说,早期中国研究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或

许也有其可资借鉴的意义。

王国维、傅斯年等人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的接受者传播者,他们的古史研究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和中国学术的新时代。现代中国学术的进步始终是与西方学术界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传播紧密相联的。西方早期中国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评研究等等,启发带动着中国同行的研究。事实上,开放的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识背景学者的不断交流、对话中进步。我们举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是确认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 年,这是用现代天文学研究解释《竹书纪年》“天再旦于郑”天象资料的一项成果。这项成果的发明权归属韩国学者,在断代工程之前西方学界已确认了这个结论。将“天再旦”解释成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现象的假说是中国学者刘朝阳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随后的董作宾先生分别推算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韩国学者方善柱据此假说并参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论证“天再旦”记录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环食(《大陆杂志》51 卷第 1 期)。此后,1988 年美籍学者彭颀钧、邱锦程、周鸿翔不仅也认定“天再旦”所记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环食,并对此次日食在“郑”(今陕西省华县, $\lambda = 109.8^{\circ}\text{E}$, $\varphi = 34.5^{\circ}\text{N}$)引起“天再旦”现象必须满足的天文条件,第一次做了详尽理论分析和计算,并假设食甚发生在日出之时,计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转变化的相应的 ΔT 为 $(5.8 \pm 0.15) \text{ h}$, 将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夏商周断代工程再次确认了“天再旦”这一成果,并为此于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网实地观测验证。

本丛书不仅是介绍西方学者一些具体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成

果,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技术、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个开放性的不断探索前沿课题的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这就算是我们寄望于《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的又一个意义。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通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时刻,愿《早期中国研究》丛书能够坚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欢迎所有建立在丰富材料缜密分析基础上、富有独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国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长久的事业,我们只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来襄助。

朱渊清

2006/12/2

写于学无知室

再版序言

本书原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台北:2006年6月),从初版至今已过六年。虑及大陆学者得之不易,笔者乃通过原出版社的许可而开始准备一本简体字再版,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此六年之间,笔者对郭店楚简各方面的研究有所进展,尤其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上(如字词释读等),因而如今的看法与原书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然而这些问题亦为数不多,大体上本书所述仍能代表笔者对郭简的种种想法,所以此一再版还是以不动原文为原则,唯有必要的时候乃以“再版新按”的方式另外加注,以便说明现在看法的不同。其实本书诸篇当中,有的早在1999年或2000年就已撰写并刊登,而十几年后除了个人研究有所进展外,整个学术界的新成果亦相当之多,但也实在无法一一补入。例如本书前几篇当中,有几处谈及《缁衣》题材与作者问题,而未能提到如虞万里、梁涛等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原因就在于当时那些成果尚未问世,如今只能请读者将拙著与彼种大作合看。本年年底,笔者亦将出一本郭店楚简综合研究与英译(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东亚系列),将较为全面地收进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侧重点则与之不同,尽管一样是以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此固不用说),然而主要还是反映笔者个人的见解、推想及一些不成熟的猜测。今日出此简体再版,旨在能让更多的同行同好得以过目,以便求正于两岸各地大方之家。

初版自序

郭店楚墓竹简，即 1993 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墓所出战国时代楚国竹书。进行考古发掘之前，此墓曾被盗过两次，部分器物已不存，然竹简幸而几乎保留无遗。郭店楚墓位于当时楚国之地，具有多种战国中期偏晚及晚期偏早的楚文化特征，据考古专家推测，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最晚也该在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前，此说大致已成共识。^①至于陪葬其中的竹书，其著作及抄写自然要比此早些，因而泛称之为公元前 4 世纪之产物，盖较符合实况。据墓制及礼器种类，墓主大概相当于上士或下大夫一级，过去学者多以为即太子之师傅，然证据实乃不足，至今只能存疑。^②

墓中有字竹简共计七百三十枚左右，竹简形制不尽相同，字体亦颇不一致，当初整理者据竹简的长短、形状、编线契口间距离，以及字体、书法特征及简文内容等因素，将原为散乱且部分残损的竹简相互系联而分成若干篇，乃为之题篇名，以图版、释文及注释为

① 参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 年第 7 期，页 35—48；徐少华，《郭店一号楚墓年代析论》，《江汉考古》2005 年第 1 期（总第 94 期），页 68—72。

② “东宫之师”之说，见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收入姜广辉主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 月，页 13—17。

目而编成专书,即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①其中有三篇,章节内容与传世《道德经》相同,合起来相当于后者的五分之二,另外有一篇大致相当于《礼记》所载的《缙衣》篇(然章序不同)以及于马王堆亦曾发现过的《五行》篇(经部)。此外全都是未曾见过的逸书,且除了一篇言宇宙生成的《太一生水》及难以归类的《语丛四》两篇外,这些逸书全属儒家一类。《郭店楚墓竹简》共计十八篇,包括《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缙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下称《成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及《语丛四》。本书内所论述,除了一篇专讲《语丛四》外,重点皆在儒家部分。

诚如方家所常道,自西晋武帝时掘出汲冢竹书以来,先秦墓中未曾发现如此重要的思想文献群,因而自从《郭店楚墓竹简》出版问世后,学者便一窝蜂地齐齐拥来研究。就儒家部分而言,郭店楚简诸篇之论人性、人情与礼乐等人道之关联,即如庞朴所谓“补足了孔孟之间所曾失落的理论之环”,^②或如郭店简所见“五行”、“六德”等各种道德范畴及仁义内外之分合等问题,亦可与《论语》、《孟子》及《礼记》等书参照而填补不少战国中期儒学思想史上之缺。至于其学派归属,自从李学勤、庞朴两位大方家谓其中若干篇该与《子思子》有直接关联后,^③多有学者讨论此议题,笔者亦曾加入其数。由于《缙衣》一篇沈约早便谓“取《子思子》”,而刘瓛则谓“公孙尼子所作”,而郭店楚简他篇中又与沈氏所谓同样“取《子思子》”的《表記》、《坊记》、《中庸》及“取《公孙尼子》”的《乐记》或多

①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据该书前言,其中释文由彭浩、刘祖信及王传富三位所隶定。

② 庞朴,《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收入《郭店楚简研究》,页9。

③ 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收入《郭店楚简研究》,页75—80;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收入《郭店楚简研究》,页22—35。

或少都有思想或体裁上之联系,因而郭店简之学术归源实可从多方面立论。^①本书第三、四两篇即多围绕此问题来探讨郭店楚简的儒家思想内涵。

郭店楚简儒书究竟能否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自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然从其内容、辞句及用词等方面之共同点推论,其中数篇亦毫无疑问有其相互关联紧密之处。^②若自其同者视之,郭店楚简儒书有其一致的关怀及反复的论点,然而,尽管这些盖多与儒家之所以为儒者相等,亦多有未如郭店简之突出者。如其中几篇所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未尝不是儒家治道之核心理论,而如《缙衣》所谓“刑不式而民咸服”,《尊德义》所谓“民可导也,而不可强”等,对刑罚之政此种强烈贬抑,于郭店简数篇较为一致,而于后来儒者则多有粗细轻重之分。凡如此种情况,皆有其历史因素及家派互动之影响,随着时间之荏苒而演变。若将之放在整个先秦思想史的脉络当中,似可就先秦儒学史乃至诸子百家间之学术史得出更加清楚的认识。本书第一、二两篇所述,便是此一类的状况。

然而一切思想史上之讨论,乃不得不以文本为基础,而郭店楚简此种文本,实在堪称复杂无比。如上所言,竹简原为散乱、残损,而《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所作的系联与分篇等工作尽管已算相当完善,然篇内简序仍难免有许多可以商讨之处。简上所书皆为楚国文字,字体结构多与秦汉后文字有别,古文字专家虽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然仍有许多难以隶定之字,更何况其中讹化、误写者亦不少。^③非但如此,由于先秦文本中通假字所占比例远超后世所见,因而简中字词之正确读法亦往往难测,且古音与今音宛若天壤

① 亦有人主张其与子游一派有关,详情见本书第四篇《以新出楚简重游中国古代的诗歌音乐美学》。

② 其说见本书第三篇《郭店楚简儒家逸书及其对后世儒学思孟道统的意义》第二节及第六篇《郭店楚简儒家逸书的排列调整刍议》前言与结语两节。

③ 参袁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华学》第六辑,2003年6月。

之别,再加以楚国方言的因素,则诚然难以返其真。对竹书文义之理解自然依赖于文字释读,然此种认识同样亦无法离开基于上下文的推测。因而文字之隶定、字词之释读,乃至文句之句读、竹简之顺序以及章节之内容,凡如此之类实不得不同时兼顾,方可望琢磨出其相互间的正确关联。然假若尽量利用古文字学、上古音韵学等领域的成果,再以谨慎的心态找出传世文献中相同或相类的章节词句来进行仔细的校对,我们就对郭店楚简庶几可以得出最为合理的诠释。缺少此种努力,其思想史上之内涵实乃无从论起。准此,本书第五篇以下所探,皆为此类小学方面的问题。

基于上面所述,本书分为两部,分别题为“宏观篇”与“微观篇”。“宏观篇”共有四篇,所论者皆为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之思想上及学术史上的探索,包括其中“以人治人”的思想、礼乐美学思想、“情义终始”论等重要哲学观点,以至于这些思路的历史背景、其与战国诸子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后世儒学的种种影响。“微观篇”共五篇,所论者乃为诠释郭店楚简的具体问题,如若干竹简的排列顺序、有关章节文句的句读与解释,以及个别字词的可能释读,同时亦包括一篇专讲郭店简等出土简帛该如何与传世文献相互校对的诠释理论。今先将各篇的概况分述如下。

“宏观篇”的第一篇《从礼教与刑罚之辨看先秦诸子的诠释传统》以郭店楚简为中心探讨中国诠释传统早期的发展。春秋战国可以被视为中国诠释传统的萌芽时期,当时《诗》、《书》等书已渐有定本,而在孔门弟子与其后学的笔记与论文当中,这些经典的章句诠释往往成为其论说的核心所在。此时期亦为百家争鸣的时代,各个学派皆是壁垒森严,为了能与孔门分庭抗礼,不得不对儒者视为权威的先王之言论及经典,加以自己的说法与诠释。然而其中所采用的方法与手段则有数种。本文拟针对当时的一项热门命题——即礼教与刑罚之辨——分析各派是如何应用前人之言论来为其本家之说立论的,以便探讨先秦时期诠释学的发展过程。通

过此种对历史传记及诸子百家有关记载的分析,希望将有助于厘清中国诠释学史的基本发展路线。

基于第一篇所论,第二篇《从楚国竹简论战国“民道”思想》,则进一步探索礼乐思想与法治思想的辩论过程及郭店楚简于此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战国晚期到西汉的文献来看,“人道”、“民道”此种字眼,早已成为儒家之治道思想的一种标志。在此种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郭店楚简所代表的战国中期儒家著作,实堪称具有最关键的地位。本篇将先分析郭店简所论的“民道”思想,之后再讨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文献中与此相关的章节,以便将其中的义理脉络予以梳理,就其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加以探讨。其中除了“民道”等字眼外,“造父御马”的比喻亦成为辩论中修辞上的一个焦点,而从百家何以各自描述此种御马之正术着眼,亦可以得知诸子之间较为微妙的一些互动关系所在。

前两篇已泛论郭店简在整个先秦思想史脉络中的角色,第三篇《郭店楚简儒家逸书及其对后世儒学思孟道统的意义》则退一步而探讨其本身的思想体系与学派归属,以及这些问题给后来的儒家道统所带来的意义。从宋代理学家直到现代新儒家,莫不以子思、孟子为其所传承之道统的关键人物,然如《中庸》等相传为子思所著之书,是否确实代表子思学派的思想,或许可以通过郭店楚简而得到证实。本文在李学勤、庞朴等学者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与《子思子》之关系。主要是以徐复观、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对《中庸》篇之阐发为纲领,通过郭店楚简来看《中庸》等篇章是否能反映出一种与子思或其稍后年代相当的思想体系。诚若如此,则子思此一儒家道统的重大祖师之一,乃能有望重新回归其传统之地位,因而当代儒者亦将能确认他们的思想渊源究竟有何等之深厚。

第三篇亦对郭店楚简中的音乐思想及其与公孙尼子可能的关系有所论述,第四篇《以新出楚简重游中国古代的诗歌音乐美学》

则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毛诗大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论之宗,而历代诗论多以《大序》所论为其出发点。其言情性“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发为诗”,以至于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所论亦与传统乐论之祖《乐记》相互辉映,而两者皆对后代之诗歌美学论有莫大的影响。此二者虽相传分别与子夏、公孙尼子有关,但由于文献之不足征,而无法确切地追溯其思想渊源。然而最近几年所出土的郭店楚简等早已失传的先秦儒家逸书,对于中国早期的诗论、乐论之发展,可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本文拟以《性自命出》篇为主,探讨其思想渊源,接着将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加以进一步的发挥,以便给中国之传统诗歌音乐美学做一初步的溯源。儒家素以“成于乐”为造极之境,“宏观篇”亦顺趣而以“乐”论为终。

“微观篇”的第一篇,亦即本书第五篇《古今文献与史家之喜新守旧》,就如何以新出古本与旧传今本进行有效的校对此一问题加以探讨,可视为“微观篇”的理论基础。今日所看到的传世文献,由于历代所混入的种种讹误与妄改,已远非当时著作之原貌,然通过文本校勘及训诂等方面的知识,盖可望于大略复其原状。于此,较为纯朴的出土简帛正有助于了解传世文献之原形及后世的改动所在。然反过来讲,欲理解难以通读的出土文献本身亦不得不依赖于早已经过整理的传世文献所给予的讯息。然则进行古今文献校讎时,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处理方式、判断标准及研究心态?本篇主要以郭店楚简为例,针对古今两文本间之差异性的处理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藉此考虑如何避免某些至今仍然见到的学术偏见与障碍。

此后第六到第九篇,乃将此种理论付诸实施,对郭店楚简中种种具体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处理。《郭店楚墓竹简》对于研究先秦文字、历史、思想等均有重大意义,自从1998年间世后,一直为国内外学者瞩目。当时既有彭氏、刘氏、王氏等人的释文及裘锡圭先

生的修订建议,后来又有许多学者提供补充意见的论文及专著,皆对《郭店楚简》的释读有巨大贡献。然由于楚系文字中形体的变化、假借的习惯等因素,再加上史者的遗漏、竹简的残缺等问题,均使文章的本意晦涩难懂,因而至今仍有部分词句令人费解。笔者不揣寡陋,乃就此几篇中若干难题提出一些猜想与推测。

第六篇《郭店楚简儒家逸书的排列调整刍议》,就竹简形制相同的《六德》、《尊德义》及《成之》等三篇提出几处竹简顺序上的调整意见,亦从字体上讨论为何不可于此数篇文本之间调换竹简,最后就郭店楚简之整体性问题提出一些值得考虑的现象。第七篇《读〈尊德义〉札记》,对较受冷落的《尊德义》篇几条文字的释读提出新的解释,同时亦对该篇的韵文特征加以初步的探索。《尊德义》思想内容堪称丰富,然而由于难识与莫名之字特多,且竹简顺序亦有不少不明之处,因而其思想内涵至今仍然无法彻底理解。本篇则是笔者为了破除这些障碍所作的一种尝试。第八篇《郭店楚简〈成之〉等篇杂志》,亦针对郭店简几篇儒家逸书中的部分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以便能够对其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达到进一步的认识。先就《成之》篇,作两处简序上的调整,乃至突显出其中“恒”、“疾”、“终”的进阶概念,又对某些字提出新的读法,试图就圣人对善道之“不舍”此一观念得出更加深入的理解。后文则又对《唐虞之道》作几处简序调整,对《六德》中“多”字给予新的解释,对《语丛一》诸简之间的编连及字词的释读亦提出种种说法,望能对郭店楚简之通读问题作出微薄的贡献。最后,第九篇《从〈楚辞〉韵例看郭店楚简〈语丛四〉》,对郭店简中此最为独特的一篇进行详尽的韵读分析、简序调整以及文字释读。此一方面分析《语丛四》各章内之合韵情形而与《楚辞》之分韵情况相互比较,以便探求对于《语丛四》所从出的方言韵文环境得出初步认识。然同时通过韵读分析之后,《语丛四》多处的释读、句读、文义及简序等问题可藉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甚至于简文中或可能为误抄或妄改之处,亦